

山·西·教·育·出·版·社

徐 梓 王雪梅 編

蒙學 輯要

蒙學
便讀

蒙學
歌詩

蒙學
須知

蒙學
要義

徐 梓
王 雪梅 編

蒙學便讀 蒙學須知
蒙學歌詩 蒙學要義

蒙學輯要

〔晋〕新登字 3 号

蒙 学 辑 要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 11 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8 字数: 918 千字

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 000 册

*

ISBN 7—80578—805—7

G · 798 定价: 16.50 元

中国传统启蒙教材概观

启蒙，在我国古代又有开蒙、发蒙、训蒙、养蒙等别称。

“蒙”有幼稚和暗昧两重意义，“蒙谓暗昧也，幼童于事多暗昧，是以谓之童蒙焉。”〔1〕启蒙的目的就在于启迪童稚、消除暗昧。虽然，暗昧并不一定局限于儿童，但启蒙主要是指对八到十五岁的少儿所实施的小学教育。这一教育主要在书馆、乡学、村学、家塾、冬学、义学、社学等名称不同的处所进行。所谓的启蒙教材，也就是实施这一教育所使用的课本。

传统的启蒙教材多用韵语、歌诗和偶句编写而成。用语体文编写成的教材也所在皆是，比如朱熹所辑的《小学》就是如此。实际上，故事在传统启蒙教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。如在明代刊行的《日记故事》、庐陵胡继宗所辑的《书言故事大全》，大都是儿童自身的故事，成人色彩较少，足以启发儿童聪明。宋吕本中的《童蒙训》、吕祖谦的《少仪外传》和清张伯行的《养正类编》等，则是另外一种类型，大都是所谓先贤们的嘉言懿行。更值得注意的还有图画一类，如明焦竑的《养正图解》、涂时相的《养蒙图说》、陶赞廷的《蒙养图说》等，也都流行得较广。不过总的说来，以语体文编成的启蒙教材毕竟是少数，（崔学古的《幼训》、唐彪的《父师善渗法》、王筠

的《教童子法》等讲训蒙的方法，陆桴亭的《论小学》、许衡的《小学大义》等讲蒙学的意义，属于蒙学著作，但不是启蒙教材）并且，它们用作教材，仅仅起一种辅助的作用，是歌诗和韵对这种主导型教材的补充，其性质近似于现在的课外读物。

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，我们把传统启蒙教材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：周秦汉魏六朝是第一阶段。这一阶段的启蒙教材以字书为主，内容比较单一，题材较为固定。隋唐五代是第二阶段，这一阶段的启蒙教材突破了前一阶段单一的格局，内容以宣扬伦理说教和传授历史知识为主，识字已退居次要的地位。在形式上，除了单纯的韵语之外，还出现了偶句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。北宋到清中叶，是传统启蒙教材的繁荣、分化时期。所谓分化，是指教材的内容专门化；所谓繁荣，是指在全社会，各种题材、各种类型的启蒙教材层出不穷。清中叶以后，特别是戊戌维新之后，传统启蒙教材虽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得到延续，但变革已成为它发展的主流。

周秦以降迄于隋，启蒙教育以识字为主，教材也是适应于这一要求编辑而成的。由于识字教育是其它教育的重要基础，所以古人十分重视这一程序，以至小学几乎等同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。虽然，作为教育初级阶段的小学 and 作为经学根底的小学在程度上大不一样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要识别汉字的形、音、义。并且，最初的字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启蒙教材，二者并无分野。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”，〔2〕表明了识字是小学阶段的首要任务。汉代将“太史试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

又以六体试之，课最者，以为尚书、御史、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，字或不正，辄举劾”〔3〕著为法律，反映了人们对文字的重视，也促进了识字活动的开展。

在论及最早的字书或启蒙教材时，有必要提及《苍颉篇》。相传苍颉是黄帝时的史官，汉字的创造者，然而《苍颉篇》并不是出自他之手。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，为了教学童，作了《史籀篇》。到了秦朝，李斯、赵高和胡毋敬各自取材于《史籀篇》，改形繁的籀文为秦篆，分别作了《苍颉篇》、《爰历篇》和《博学篇》。汉代在民间教授的先生又将这三部字书合并，题名为《苍颉篇》，每六十字为一章，共五十五章，凡三千三百字。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，元帝时史游作《急就篇》以及成帝时李长作《元尚篇》，也都取法于《苍颉篇》，无出其三千三百字的范围。因此可以说，早期的启蒙教材脱胎于《史籀篇》，而在《苍颉篇》的羽翼之下演化。

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，既不是《史籀篇》，也不是《苍颉篇》，而是后来的《急就篇》。它的作者史游是汉元帝时的黄门令。之所以以“急就”为名，是说有不认识的字，缓急都可以就而求之。篇中或七言、或三言、或四言，不求一律，共三十四章，其字排列约略以类相从，只是不列名目。它“罗列诸物名姓字，分别部居不杂厕”，从陈说姓名到介绍各种物品名称，从条列做官为宦的基本功到歌颂盛世承平，真可以说是“包括品类，错综古今”。〔4〕由于它“泛施日用，颇便于闾里书师”，〔5〕尽管缙绅秀彦、膏粱子弟以其鄙俚而耻于窥涉，但蓬门野贱、穷乡幼学，则递相承禀，竞相学习。从汉魏到隋唐，《急就篇》都是一部在民间流行极广的启蒙教材。唐以后，由于更具魅力的启蒙教材的出现，它才逐渐被废止。

汉魏而下，与《急就篇》相伴随，以识字为目的编成的启蒙教材还很多，这些书现今大都已经亡佚。仅从篇名上看，东汉蔡邕的《勤学篇》、三国吴项竣的《始学篇》、晋束修的《发蒙记》、顾恺之的《启蒙记》、王羲之的《小学篇》、颜延之的《诂幼》以及佚名的《小学》等，无疑都是蒙童的识字教材。此外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小学类中著录的其它字书，或许不象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小学类中所著录的字书那样普遍地用作启蒙教材，但其中一些曾经充任过启蒙教材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这一时期最为著名，此后流传最广的启蒙教材，当数南朝梁周兴嗣所编的《千字文》。无论是就其名题还是就其编辑旨趣而言，它都是为了启蒙，为了识字的目的。据唐李肇的《尚书故事》记载：“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片纸，杂碎无序。武帝诏兴嗣谓曰，‘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’。兴嗣一夕编缀进上，鬓发皆白。”可见，编缀条贯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加方便地识字。只是因为它组织得太精致，以至于失去了本来的意义，成了一篇文采斐然、千古流传的绝妙文章。它原有的性质在大量的别本和续作中，反而相对地清晰可见。传统的目录著作将各种文本的《千字文》著录在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蒙学门中，是极其精当的。

成书于这一时期，在唐代应用较广的《开蒙要训》，也属于字书一类。日本人滕原佐世的《日本现在书目》将它收录在小学类，列在顾恺之的《启蒙记》和王羲之的《小学篇》之后，而在周兴嗣的《千字文》之前。由罗振玉辑印在《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》影印的五张唐写本的残页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《急就篇》的余波，近世《日用杂字》、《幼学杂字》、《农庄杂字》一类的先河。此书的作者姓马，名字则不详，有人推

定它成书约在东晋与齐梁之间。这一时期所出现的《杂字指》、《杂字要》、《俗语难字》等，可能也与它属于同一类型。

隋以前的启蒙教材以字书为主，当然也有逸出于这一主潮之外的。现存我国最早的启蒙读物《弟子职》，就是另外一种类型。《弟子职》是《管子》中的一篇，但没有人认为它出自管仲之手。有人认为它是稷下学宫的学则，也不过是猜测而已。《弟子职》叙述弟子礼敬老师的仪节、受业的次第，或五言六言，而以四言为主，皆句短而音谐，颇便于蒙童诵习。直至清代王筠为之正音，依然为着“家塾训蒙之用”的目的。

隋唐五代时期，启蒙教材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类型各不相同。约而言之，可以以下三种为代表。

唐中叶之后，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启蒙教材是《太公家教》。其内容以规劝人们接受封建伦常为主，所谓“教子之法，常令自慎。言不可失，行不可亏。他离莫越，他事莫知，他贫莫笑，他病莫欺，他财莫取，他色莫侵，他强莫触，他弱莫欺”之类。至于“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师焉；择其善者而反之，其不善者而盖（改）之，”显然是录自《论语》。“女慕贞洁，男效才良，行善获福，行恶得殃”，取材于《千字文》而少有变化。其它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”，“小而学者，如日出之光；长而学者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学者，如日暮（暮）之光”等等，也都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，可见它主要是辑录前人的嘉言而成。它的语句或长或短，以四言为主，但不拘于四言。所以无论其内容还是其体式，都与后来的《增广贤文》、《名贤集》没有什么不同。尽管此书在中唐以后流行过一段时期，但可能因为它是启蒙教材，又仅

仅汇编前人之言，失于浅陋鄙俚，（宋人王明清《玉照新志》卷三中就有这样的评论）所以公私藏书都不曾注意，唐宋史志及其它目录著作也都没有收录，只是在宋人笔记中屡屡被提及。王重民先生论定说：“《太公家教》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。大概说来，自从八世纪的中叶直到第十世纪末年（750—1000）通用在中国本部；第十一世纪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（1000—1650），还继续不断的被中国北部和东北的辽、金、高丽、满洲各民族内说各种语言的儿童们所采用。这个童蒙读本的流传之广，使用时间之长，恐怕没有第二种比得上它的。自从第十一世纪以后，这个童蒙读本在中国本部因为有了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来代替它，流行的程度就渐渐减低，而通行的地理区域，也就渐渐仅限于中国的北部和东北部。宋室南渡以后，到南方去的士大夫们，好像就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《太公家教》了！”〔6〕至于“太公”何所指，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。此书作于何时，出于何人之手，已难以考定，但从宋人王明清以来，大都认为它是“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”。

这一时期出现的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启蒙教材，还得数李翰的《蒙求》。李翰的生平已不能详考，《四库提要》的作者以他为五代后晋时人，后来的学者多有辨驳，而以他为李唐时人。《蒙求》四字一句，每句都记一件历史故实，两句组成一联。全篇裁对工整、又协音韵，所以“自中唐至于北宋，是书为童蒙课本，最为通行”。〔7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种体裁的启蒙教材在唐代已不止李翰《蒙求》一家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就著录有王苑的《续蒙求》、白廷翰的《唐蒙求》，续作之外，还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。这一趋势在宋元时期终于形成

高潮，出现了《左传蒙求》、《两汉蒙求》、《三国蒙求》、《晋蒙求》、《南北史蒙求》、《宋室蒙求》以及《本朝蒙求》，各代有作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。王令的《十七史蒙求》、胡宏的《叙古蒙求》则通贯历代。其它如《晋史属辞》、《唐史属辞》、《通鉴韵语》乃至《龙文鞭影》，也都是仿效李瀚，不过无“蒙求”之名而已。此外，还有徐伯益集妇女事实而成的《训女蒙求》，胡炳文集古人可以取法言行属对为韵文而成的《纯正蒙求》以及《小说蒙求》、《叶才老和蒙求》、《赵氏家塾蒙求》等等，不可胜数。

隋唐时期，科举制度确立。为了应试的需要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偶句或对类一类的著作。这种情形在启蒙教材中的反映，就是《兔园册》的出现。《兔园册》又名《兔园册府》，有的著录为三十卷，有的著录为二十卷。关于它的作者，有的说是唐初大臣虞世南，更多地则说是唐蒋王李恽的僚佐杜嗣先。关于它的内容，《困学纪闻》说是“仿《应科目策》，自设问对，引经史为训注”；《郡斋读书志》则说它“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，皆偶丽之语”。现在所存的写本残卷，只有序文一页，不能判定它的内容。现代研究者大都依从晁公武的说法，认为它是以对偶骈体的文字，分门别类地叙述各种知识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后来影响很大的《幼学琼林》相似。至于它的功用，或者说是“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”；〔8〕或者说“五代时行于民间，村塾以授学童”。〔9〕总之是用作启蒙教材。

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，隋唐五代启蒙教材的数量虽然不太多，但形式多样，内容也相对地丰富，我们已不能用单一的主线去把握它的整体特征。从形式上看，有韵语、有偶句，也有不拘短长汇辑名言谚语；从内容上看，有张扬封建伦理

的，也有介绍各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。传统启蒙教材的各种类型，这时已大体齐备。以后的启蒙教材尽管林林总总，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。所以，隋唐五代在传统启蒙教材发展过程中的意义，在于它结束了前一阶段单一的形式和内容，为下一个阶段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宋元明清四代，启蒙教材呈现出一派万壑竞流的景象。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启蒙教材的广为传播，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。儒家理学的确立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渗透和控制的要求，从而导致了教育范围的扩大，引发了对各种类型的教材的需求。随着学塾课程的多样化，教材也相应地专门化，除了作为基本教材的课本之外，还有辅助教材和课外读物。这些因素，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启蒙教材的空前繁荣。

综合性的教材以它内容丰富、功用兼备的优势，压倒了其它专门性的教材而最为风行。一般来讲，在学塾的课堂上，都是以综合性的教材做教本。内容专门的教材，往往是作为辅助读物，供学生在课余诵读，以扩大知识面的。另外，一些宿儒临时充任训蒙教师，一时找不到或者不满意这些综合性的教材，还有的则是在这些基本的教材讲授完了之后，就自己最熟知和自认为最重要的内容，编成教本，很多启蒙教材就是这样编成的。

最著名的综合性教材，当然是《三字经》。一般都认为它是南宋末年的大学者王应麟所作，也有的考定说是成书于元延祐之后，还有的说出自明代黎贞之手。就其中称赵宋为“炎宋”，所举的事例都是宋代和宋代以前的，我们认为它作于宋代的可能性比较大。《三字经》文字简洁，善于概括，在不长

的篇幅里容纳了大量的知识和道德说教。它三字一句，短而谐韵，便于记诵。其内容很适合封建时代的教育，其形式又极便于蒙童。比起《千字文》来，它更加浅明切用；比起《百家姓》来，它则有包容面广的优势，所以它当之无愧地成了封建时代最佳的启蒙教材，也是流传最广最久、影响最大的一种。尽管有人对它开篇就说性命，以富贵功名劝学不满，但丝毫也没有减少它历久风行的魅力。历代刊刻、注释、续作、改订的不乏其人，至于依循这一形式，甚至借用这一名义的也大有人在。直到现在，《三字经》的形式和名义依然没有丧失它的活力。

《幼学琼林》的综合性就更大，内容上分为三十四门毋需多说，形式上也综合了对句和典故两种类型。它又名《成语考》、《故事寻源》，举凡天文地理、岁时节令、文臣武职、道德伦理、身体服饰、人事日用、疾病死丧、释道鬼神、鸟兽花木等等，无不网罗其中，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。相对地说，它较少道德说教，而以传授知识为己任，让人有亲切可读之感。最可称道的还在于它组织的精妙，不求文句的整齐一律，而是随意所在，当长则长，当短则短，惟求两两对偶而已。它风行于世的另一层原因还在于，与仅仅出示典故的各种蒙求读本不同，它的正文本身就释典解义，以至于不用考索就能理会，阅读起来少有滞碍。一般都说它是明朝程登吉所作，也有的说它的作者是景泰时的进士邱濬，清人邹圣脉既为之增补，又为之注释，这个增补注释本是《幼学琼林》最为通行的版本。

两宋时期，理学逐渐形成，它阐释义理，兼谈性命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股强劲的学术和社会思潮。它的出现，不仅强化了对道德伦理的要求，而且导致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命题

的出现。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命题的意义，不仅是接受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第一步，而且也是自觉地以儒家伦理规范自身行为的需要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理学的影子便投射到了启蒙教材之中。

这一类型的启蒙教材最有影响的是《性理字训》。它的书名极为准确地传达了它的内容，也就是训释有关性理一类概念的涵义。先是，朱熹的学生程端蒙作了三十条，宋元之际的程若庸又广为增订，扩大到了一百八十三条，明初朱升将它辑入《小四书》时，又增加了“善”字一条。所以这部小书历经三世，出于众手。全篇凡分造化、性情、学力、善恶、成德和治道六个门类，每四字一句，各条少或两句、多则八句。与其它启蒙教材不同的是，它不求声韵的谐合，所以颇棘唇吻，尤其是它专讲性理，颇为玄奥，从形式到内容都极不便于儿童。尽管如此，由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，这个颇为奇异的读本依然受到了人们的称赏。人们称赞它是“经学之总要”，其中“修为之次第具焉。”〔10〕元代程端礼在《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的卷首，规定八岁未上小学之前，就要先读此书。

宋代王柏的《伊洛精义》也是宣传理学的启蒙读物。伊、洛是洛阳附近两条河的名称，因为理学的开山祖程颢、程颐是洛阳人，所以以此标明学派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所师承的正是这一学派，它被看作是理学的正宗。全篇辑伊洛诸儒训释经书中的精义要语，末则归理学大明之功于朱子，以此教授蒙童，作为它日穷理的基础。由它开篇一段：“太极者何？曰理而已。至极浑沦，万化根柢。动而生阳，静复阴耳。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。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矣。健而无息，是谓之乾。顺而有常，坤之谓焉。以性情言，故曰乾坤。以形体论，天地

斯名”，我们可知其内容和体例。

宣传理学的启蒙教材还有很多，如陈淳的《初学经训》，“彙括经书训语，举群圣为标准，训之使养其良知良能。”〔11〕程端蒙的《毓蒙明训》以及饶鲁的《训蒙理诗》、朱熹的《训蒙绝句》，也属于这一类型。元人熊大年曾依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七言的顺次，将宋人所撰的九种启蒙读物，编为《养蒙大训》，其中大多数都是有关理学的。这类读物，由于它侈谈性理，过于玄奥微妙，又因为不能曲意谐韵，颇棘唇吻，总之是既不易理会又不便诵读，因而传播不广。

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说教，一直是传统启蒙教材的中心内容，除了在综合性的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之外，还有大量专门性的读物。我们所见的较早的一篇是宋人陈淳的《经学启蒙》。它虽然以“经学”标题，介绍的却不是经书、经师和经义。它以“天地性，人为贵。无不善，万物备。仁义实，礼义端。圣与我，心同然。性相近，道不远。君子儒，必自反。学为己，明人伦”开篇，以下则叙述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男女、长幼、朋友之道，言行、居思、视听、容貌之节，其体式及部分内容都为以后的《三字经》所采用。此篇又名《启蒙初诵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前的启蒙读物大都是四字一句，是它首创了三字一句的先例，并且从全篇来看，运用的已经十分纯熟。

这一类中，以三字一句这种形式所编成的启蒙教材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是清代绛州人李毓秀所撰，原名为《训蒙文》，后经贾木斋修改后，改为今名。全篇以《论语·学而》中的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一段为纲，以三字一句，合辙押韵的形式，阐释入孝出悌一类的具体内容。它曾被称颂为“便于

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行”的“开蒙养正之最上乘”之作，清朝的一些地方政府还飭令所属州县，将它列为私塾和义学的必读书。影响所及，使历久风行的《三字经》也大大逊色，“近李氏《弟子规》盛行，而此书（指《三字经》）几废。”〔12〕

传授封建伦理的启蒙教材的另外一种类型，是汇编所谓先贤的格言至论而成的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增广贤文》。它或辑自雅言，或采录俗语，不拘一格。正因为如此，内容也就良莠不齐，精华与糟粕杂陈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，而不再仅仅一味地宣传儒家的道德理想。人们称它是做人的良方，处世的诀窍，所谓“以之律己，可以修身；以之处世，可以寡过；为人之道，颇具于此。”〔13〕此外还有“读了《四书》知礼义，学了《贤文》会做人”以及“读了《增广》会讲话，读了《幼学》会看书”等等说法。此书的作者及辑印年代已不可考定，自清后期以来，即风靡全国。它的版本甚多，而且内容也有很大的出入，编排各不相同，名称也不一致。除了《昔时贤文》、《古今贤文》这些异名之外，同治时的周希陶曾有所删削增益，又次以平上去入四韵，复略为注音释典，以成《重订增广》。清咸丰时的硕果山人认为它多口头俗语，涉持要言，以之训蒙，最易上口，厘订补缀之余，又以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和杂言重新编排，定名为《训蒙增广改本》。同样不知编者姓名的《名贤集》，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，都与《增广贤文》没有什么两样。

伦理性启蒙教材的第三种类型是用歌谣编写成的。这里首先必须论及的是明朝吕得胜、吕坤父子的《小儿语》和《续小儿语》。吕氏父子刻意仿效儿童口语，尽力去文就俗，如“一切言动，都要安详，十差九错，只为慌张”，“老来疾痛，都

是壮时落的；衰后冤孽，都是盛时作的”。如此之类，确乎通俗浅明，易诵易晓，所以儿童读起来，“如说话，莫不鼓掌跃诵之，虽妇人女子，亦乐闻而笑，最多感发。”〔14〕此外，吕得胜还编有专门供女小儿读的《女小儿语》，吕坤则收集儿童歌谣编成了《演小儿语》。除了这四部小儿语之外，吕坤的《好人歌》、《训子词》也属于这一类型。吕氏父子的上述作品，在旧时流传极广，版刻甚多，人们称它们“无一字不近人情，无一字不合正理，其言似浅，其意实深”。“训蒙之切要，无有过于此者。”〔15〕这一类型的著作还有陆平泉的《劝寻方便语》、天谷老人的《小儿语补》、李惺的《老学究语》以及管滂的《家常语》等。它们所以模仿儿语，如其俚俗，又谐以声韵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使儿童在欢呼戏笑之间，学得所谓的义理身心之学。

伦理性启蒙教材的最后一种类型是诗歌，它们用四言、五言、七言写成，内容不外乎入孝出悌、尊师敬长一类，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。我国最早的蒙学读本《弟子职》就属于这一类。宋以后越来越多，到清朝更是空前地繁荣。如宋陈淳的《小学诗礼》，明方孝孺的《幼仪杂箴》，清刘沅的《蒙训》、胡侗的《蒙养诗教》、谢泰阶的《小学诗》以及罗泽南的《小学韵语》、万斛泉的《童蒙须知韵语》和佚名的《四字经》等，可以看作是这一类型的代表。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，融学则、学规和教材为一体，从形式上说，它们是教材，从内容上说，它们又是学则学规。它们所要传授给儿童的，既涉及到现今生活日用的各个方面，也涉及到日后的婚丧嫁娶和为人父母，甚至具体到了大便时所向的方位。这类教材，专门对儿童进行道德说教，要求他们接受儒家孝悌仁义那一

套，“景行维贤，克念作圣”。

从单纯的数量上讲，以历史为题材编成的启蒙教材，恐怕不在伦理性的启蒙教材之下。把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递编成歌诀，以教幼童，是从宋代开始的，并很快（大约是宋元之际）出现繁荣。这类教材简略繁富不一，短则一二百字，长则数万字，有的仅仅提及朝代的名称，有的则详述历代历朝大事。它们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，但也附着着厚重的封建意识，如善恶为治乱成败之源的观念、僭伪与正统之辨的观念、蛮夷与华夏之分的观念。可以说，它们是卷帙繁富的中国史籍的一个缩影。

《三字经》中关于历代王朝兴替的概述并不特别，在这之前已有了专门的叙述。如胡宏的《叙古蒙求》，从羲农叙述到五代后周时，共三十章。如前所述，这一时期出现了历朝历代的蒙求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。另外，胡寅的《叙古千文》则是以千字文体写成的历史，“上下数千载，关系大处，包撮略尽。兴君昏主之理乱，哲佐悖臣之功罪，吾道异端之正偏，一字森严，百世确论。”〔16〕所以早在宋代，历史类三种类型的启蒙教材都已完备，这就是歌诀体、蒙求体和千字文体。

元代历史类的启蒙教材很有代表性，大、中、小型皆备。许衡的《编年歌括》十分简略。陈栎和王芮各自有《历代蒙求》，均在八百字左右，历叙古今朝代、帝王世代及其治乱之迹，不繁不紊，简而有要。陈著收录在《小四书》中，王著有郑镇孙注，流传得都很广。黄继善的《史学提要》，叙述范围起自上古，迄于蒙元，其中又各依朝代分段，多达两卷，近一万二千字，是同类教材中字数比较多的一种。元代这一类型的著作还有陈栎的《历代通略》、陆以道的《宋鉴提纲》、倪尧